



黑水城出土《尚书句解》残页考

惠 宏

1983年、1984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阿拉善盟文物工作站对额济纳旗的西夏古城黑水城遗址进行了两次发掘，获得近3000件西夏、蒙元时期的多种文字文书，其中比较完整的760件汉文文书由李逸友先生在《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中初步整理、刊布并作研究，书后附录了部分图版。这里介绍的是编号为F1:W67、李先生纳入《儒学与文史类》之“书籍印本”中一件尚未求得出处的《尚书》注本。

一 文献的认定

内蒙藏F1:W67，暂拟题为“《尚书》残页”。《黑城出土文书》叙录如下：

《尚书》残页，为右半面，竹纸，226×138毫米，版心高226毫米，粗边栏，内细栏，现存13行，大字楷体，径10毫米，栏内双行小字夹注。^①

细核图版，残页左边为双栏，外粗内细，属于边栏，不应当为右半面，而是一版的左半部分。由于右边残缺，根据保留的部分，这种刻本半面至少有13行，当属于窄行字细、为节省印刷成本，方便读者购买的私家刻本行款。在《黑城出土文书》的研究部分，李先生又对这一刻本残页的内容进行了详细地介绍。^②

这一《尚书》注本比孔颖达疏本的确简略了许多，李先生“适宜于初学者学习之用”的判断无疑是正确的，但认为“这种注释本，也受到了历史的淘汰”之说则言过其实。实际上，这一注释本正是元代朱祖义为《尚书》所作的注解，取名为《尚书句解》。我们可以在《四库全书》《中华再造善本》等大型图书中均可发现这一注本。下面是依据《四库全书》本《尚书句解》^③对黑水城出土残页的还原：

1. 之苦一曰凶短折_{有六}因凶而至短折若好勇斗狠二曰疾_{有恶}三曰
2. 忧_{多忧患不}四曰贫_{困于}五曰恶_{为人}六曰弱_{为人无依恃}武_{则不能自立}

① 李逸友：《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201页。

② 李逸友：《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57页。

③ 朱祖义：《尚书句解》（文渊阁四库全书本6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本，第885页。

3. 王既胜殷此孔子序分器亡邦诸侯制邦国以封班宗彝班以宗庙
4. 彝尊以为作分器彝尊以为有国重器作分器作分器之书言诸侯尊卑各有分也
5. 旅葵第七
6. 西旅一葵之献微也武王受之若未甚害召公叔言而力诚之诚虑自此玩物而丧志故作此书
7. 西旅献葵西戎有旅国慕武王威德太保作旅葵召公居太保之职作旅葵
8. 之书以旅葵竹筒所惟克商武王胜商之后遂通道于九夷八蛮道路通于
9. 夷蛮来享西旅底贡厥葵故西旅亦致贡葵矣太保乃作旅葵召公作旅葵书
10. 训于王以训武王曰呜呼嗟明王慎德古者明哲之王谨慎修德四夷咸宾四方
11. 之夷皆使宾服无有远迹无远无近毕献方物尽献方土所有之物惟服食器用可以为衣
12. 服饮食器用者王乃昭德之致于异姓之邦王乃昭明已德足致远方之夷贡遂以颁赐于厥而
13. 异姓无替厥服使无废其奉上之诚分宝玉于伯叔之国分远方所贡宝玉于亲而同姓

通过复原可以看出，两者在形式上稍有不同，残页第5行的“旅葵第七”，注文另起一行，而《四库》本注文与正文紧密相连；此外两者每行的字数也不一致。除去这些形式的不同，残页内容与《四库》本《尚书句解》完全吻合，显然，黑水城出土的这一残页正是朱祖义撰《尚书句解》的刻本之一。

二 文献的作者、成书年代及其价值

《尚书句解》，全书13卷，元代朱祖义撰。朱祖义生平不见史书记载，《千顷堂书目》《续文献通考》《四库全书总目》等诸家书目虽载是书，于其作者，皆言“祖义字子由，庐陵人”，无更多介绍。今从《江西通志》卷51“选举”条目介绍的宋代科举资料中，于“端平元年甲午乡试”名单中发现有“朱祖义，庐陵人”的记载，^①而在同书随后的进士等名录中，未再次出现。此人名、地名均与《尚书句解》作者相合，当是同一人。据此可知，朱祖义是宋端平元年（1234）举人，其生平历宋、元两代。大概其于端平元年中举之后科举之路再无进展，因之未入仕途而长期从事私塾教育。

近代藏书家杨星吾曾于日本购获《直音傍训尚书句解》13卷，是元代敏德书堂刊行朱祖义作品事。《书林清话》有明确记载，（敏德书堂）于“泰定丙寅（三年）刻元朱祖义《直音傍训周易句解》十卷，见《森志》。至顺庚午（元年）刻《广韵》五卷，见《森志》《杨志》、□□、《陆续跋》。无年号刻《直音傍训尚书句解》□卷，见《杨谱》。”^②《尚书句解》的刊刻时间虽然不详，但应该与泰定丙寅年（1326）、至顺庚午年（1330）这两个年号相距不远，而泰定丙寅年离朱祖义获取举人名号的端平元年（1234）已92年，假定祖义20岁中举（一般应在这个年龄段之后），泰定丙寅年朱祖义已经110多岁。朱祖义是否有如此高龄，暂不得而知，即便如此，百岁老人连续撰著《周易句解》《尚书句解》等书的可能性不大，二书的撰就应远敏德书堂刊行之前。近见杨星吾于日本购获敏德书堂刊本《直音傍训尚书句解》影件，发现此本有诸多避宋讳的阙笔现象，所涉之字有“匡、恒、贞、桓、惇”等。因此，日本学者小林辰认为：“此书板式体裁全与南宋余氏刻《古列女传》相同，且缺画宋帝讳字则（如匡、贞、

^① 谢旻：《江西通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51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本，第271~276页。

^② 叶德辉：《书林清话》卷4，民国丛书本，上海书店。

慎、恒、惇、桓之类)其为宋板也,彰彰乎无可疑矣!”^①《书林清话》的记载证明小林辰的宋版之论实在是一个误判。元代刻书避讳不甚严格,循旧刻避宋讳现象时有发生。敏德书堂避宋讳似乎可以说明以下情况:是书于宋亡之前已经撰成,或已刊行、或以抄本在民间流传,元刊时循旧本不加更改以致敏德书堂本大量保留宋讳。当然也不排除朱祖义作为南宋遗民仍念旧朝、加之元当局不重避讳而于著作中继续前朝之讳的情况。考虑到朱祖义于宋亡之时(1278)已近七旬、书中又大量保留宋讳,《尚书句解》成书于宋亡之前可能性更大。

朱祖义除撰《尚书句解》13卷、《周易句解》10卷外,《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其“於诸经皆有句解,今多散佚,惟此书(指《尚书句解》)仅存”^②。《尚书句解》得以流传正好反映了该书的作用与价值。《四库全书总目》曾作如下评价:“考《元史·选举志》,延祐中定经义取士之制,《尚书》以古注疏及蔡沈《集传》为宗。故王充耘《书义矜式》尚兼用孔《传》。迨其末流,病古注疏之繁,而蔡《传》遂独立於学官。业科举者童而习之,莫或出入。祖义是书,专为启迪幼学而设,故多宗蔡义,不复考证旧文。於训诂名物之间,亦罕所引据。然随文诠释,词意显明,使殷盘周诰诘屈聱牙之句,皆可於展卷之下了然於心口。其亦古者‘离经辨志’之意欤?以视附会穿凿,浮文妨要,反以晦蚀《经》义者,此犹有先儒笃实之遗矣。亦未可以其浅近废也。”^③从严格的学术意义而讲,《尚书句解》“不复考证旧文”、不重名物训诂,是其不足。但从成书目的来看,祖义非为辩证学术,而是“专为启迪幼学”,在封建科举取士的刻板教育背景下,专门为幼童熟读经书而编著这些简易的句解,其于传统教育史的意义非同一般。据《元史·选举志》,元代科举考试明经科,于《尚书》以古注疏及蔡沈《集传》为宗,但实际上《尚书句解》却在广泛流传,以致远流到偏远的亦集乃路,显然,该书在当时的幼学教育中应该普遍使用。这实际上反映了该书具有实用性的一面。《尚书》于诸经中最为难解,古注疏又过于繁复,《尚书句解》多宗蔡《传》,以简易明了之语注解《尚书》,既便于启迪幼学,实际也方便了书生科举应试的需要。其他儒家经典之古注古疏虽亦繁复,但经文相对《尚书》易懂,这正是《尚书句解》较它种句解受欢迎且存世下来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 黑水城出土本《尚书句解》版本考察

黑水城文献中目前发现的最晚纪年在北元宣光二年(1372),一般把这一时间看成黑水城文献的下限。黑水城出土本《尚书句解》理应在此之前,为元刻毫无疑义。此本残刻经过上文的复原,结合李先生的介绍,其版本特征如下:

蝴蝶装,为左半面。上下单栏,边栏外粗内细。高22.6厘米,宽13.8厘米(此为半页宽),版心高22.6毫米。半页至少13行,行内正文为大字,注文为双行小字,折合为大字,行17、18、19字不等。

存世的《尚书句解》主要有敏德书堂刻本、通志堂经解本、四库本。通志堂经解为清代纳兰性德

① 小林辰:《尚书句解考证》,载中华再造善本影印日藏《直音傍训尚书句解》之附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

② 永瑢:《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第98页。

③ 永瑢:《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第98页。

所辑，此本《尚书句解》现存康熙十九年（1680）、同治十二年（1873）等多个刻本；四库本则依两江总督采进本。现存元刻唯有敏德书堂刻本，此书由近代藏书家杨星吾自日本购获，全名《直音傍训尚书句解》，可用来与黑水城出土本比对。《张元济古迹书目序跋汇编》曾对该书的版本情况进行了简要介绍，近年来，《中华再造善本》将该书影印，并于2004年出版。这里依《中华再造善本》影印本对解敏德书堂刻《直音傍训尚书句解》的详细情况介绍如下：

是书题“直音傍训尚书句解”，署“庐陵朱祖义子由撰”。在《尚书》序后有“敏德书堂刊行”牌记。全书完整，无破损缺漏，蝴蝶装，白口，版心上题“书句解”、下题页码。上下单栏，左右双栏。据中华再造善本扉页介绍，原书高33厘米，宽22.5厘米。该书半页12行，行内正文为大字，注文为双行小字，折合为大字，行22、23、24字不等。行间与天头均有用朱笔、墨笔两种颜色的日文片假名所作的读法评点，当藏书者所为，应先后两人所作。刻本之后附录一手抄本，为日本学者小林辰的考证。书后拓有“星吾海外访得秘笈”“宜都杨氏藏书记”“飞青阁藏书印”等藏印。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小林辰的考证一文，此文题为“宋板尚书句解考证”，署“金芝山人小林辰 学”。小林辰原文较长，首先对此敏德书堂刻本的版本进行了考证，认为是南宋刻本；其次介绍此本旧藏浪华蒹葭堂木邨世肃之家，并对“蒹葭堂事迹”进行考证；最后以此本补订纳兰成德通志堂经解本中墨匡模糊之数十字。上文已论，小林辰视此本为宋刻实在是一误解。

依据以上信息可以析出元代敏德书堂刻本的版本情况，叙说如下：

蝴蝶装。高33，宽22.5厘米（半页宽11.25厘米）。上下单栏，左右双栏。半页12行，行内正文为大字，注文为双行小字，折合为大字，行22、23、24字不等。该书于卷首序末署“敏德书堂刊行”，文中匡、恒、贞、桓、惇等字阙笔，避宋讳。

与敏德书堂刻本相比，黑水城出土本《尚书句解》短小偏宽，应属于巾箱本。南宋戴埴《鼠璞》说：“今之刊印小册，谓巾箱本，起于南齐衡阳王（萧均）手写《五经》置巾箱中。”^①巾箱本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开本较小，便于携带。这不免令人想到，该书很可能是那些负笈西行、北上至亦集乃路上任的儒学教授带至黑水城的。据《元史》，元代于路府上中州置儒学教授，命于朝廷。李先生曾统计，黑水城文书中共出现6位儒学教授，除最后一位情况特殊外（北元时期），皆当朝廷任命。黑水城出土本《尚书句解》可能就是其中某位教授随身携带之物。根据现有的资料，我们还无法判断黑水城出土的这一巾箱本《尚书句解》的具体刊刻年代。

（作者通讯地址：宁夏医科大学中医学院 银川 750004）

^① 戴埴：《鼠璞》（文渊阁四库全书本55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本，第85页。